

想象中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研究

王海洲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象中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研究

王海洲 著

本成果系北京市教委2012年度科研计划项目
《想象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文化研究》
(编号：SM201210050002) 最终成果、
北京影视艺术研究基地2015年度重点支持科研项目最终成果之一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象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研究 / 王海洲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4

ISBN 978-7-106-04437-4

I. ①想… II. ①王… III. ①电影—研究—中国
IV. ①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62544号

想象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研究

王海洲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100029

电话：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437-4/J · 1847

定 价 38.00元

目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拨乱反正年代的银幕叙事	11
第一节 “拨乱”的阵痛：“文革中国”的叙事策略	16
第二节 “回归”的烦恼：新时期电影中的老干部形象	31
第二章 八十年代电影的文化主潮	47
第一节 相信未来：八十年代电影中的诗性生活	52
第二节 改革主潮：明天会更好	76
第三节 “我将如何生活？”：主体的觉醒与人的解放	87
第三章 再塑中国：八十年代电影中的人物形象	99
第一节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电影中的改革者形象	103
第二节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八十年代电影中的青年形象	114
第三节 双脚踏上幸福路：八十年代电影中的新农民形象	137
第四节 早晨的太阳：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少年形象	153

第四章	八十年代电影中的“知识”与“知识分子”想象	165
第一节	忍辱负重：八十年代电影中的“知识分子”	169
第二节	命运的钥匙：“知识”与八十年代电影	184
第五章	现实的困惑：纯真年代的影像变奏	195
第一节	躁动的心灵：简单生活遭遇欲望的诱惑	198
第二节	困惑的城市：父权的衰落、顽主的狂欢	209
第三节	无奈的乡村人生：传统与宿命	223
结 语		233
参考文献		239
参考影片片目		244
后 记		249

绪论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国家建设停顿，国民经济受到重创，国民的价值观受到严重扭曲，社会乱象纷呈。等到“文革”结束，饱受摧残的国民透过渐渐开启的国门小心观察，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冷战格局仍在继续，但是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大变，日本的经济强势地位已经确立，“亚洲四小龙”也各展风采，而回眸中国，在计划经济、“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政经格局下，城乡人民还处在温饱的边缘，同世界列国相比，处在经济不发达的行列。中国在上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外面的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中国人民如何建设中国？未来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不仅是当时中国政治家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大众百姓思考的问题，是艺术工作者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除旧布新的时代，人们期盼一个清晰的未来，憧憬一个梦想的蓝图。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明确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我们要

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¹ 在这些政治愿景下，加紧现代化建设、增强国力、改善民生成为党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为达到这些目标，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1980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从此拉开农村改革的序幕。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块重要里程碑。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提出了务实的探索思路。

与此同时，一系列恢复国力、重振国民信心的举措也逐渐展开。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1981年10月18日，中国足球队3:0胜科威特队，大学生上街游行狂欢，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首次获世界冠军，此后五连冠，形成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支点——“女排精神”。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健儿异军突起，金牌总数居第4位，实现零的突破。1984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国庆35周年阅兵活动，游行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向邓小平致意，表达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问题的解决有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与全民激奋的情绪相伴，思想艺术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社会大众的激奋心态自然会在敏感的文艺工作者心田激起涟漪，这种激奋的原因还是来自政策层面的宽松。“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着手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²

1 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2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在八十年代，一方面文化活动异常活跃，一方面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也在强势进行，文化艺术界成为意识形态角力最为激烈的场域。在这一论争的缝隙中，文艺的创新力量喷薄而出。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创新蔚然成风，社会科学研究也异常活跃。当然，电影界也诞生了引领中国电影潮流二十多年的“第五代”。而“第五代”出现之前的八十年代初期，电影界的变革探索已经成绩斐然，彰显着“文革”之后中国电影的新成就。

翻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历史转折点之后，我们又踏入了新的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远去了，迄今，在淡忘了十多年后，回首八十年代似乎成为一股蓬勃的文化现象。当然，每个人心怀中的八十年代是不同的。有人在八十年代电影回顾中，诗情地称八十年代为“电影的黄金时代”：“那一幕幕奔走的光影，像深海中倒映的城，里面关着春荣秋瑟，关着三世一生的爱情，还关着你眼睛里——所有的憧憬……”¹ 也有人对八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们念念不忘，在历数了刘晓庆、龚雪、陈冲、姜黎黎、王馥荔等人之后，文章评道：“写在八十年代美女们眼际眉梢的全是绽放的狂喜；是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乐观精神；是‘风雨兼程’投入大时代的渴望……她们的精力和意志似乎是没有穷尽的，每每令人畅想起孕育这些道劲鲜花的八十年代风云。”²

而我，作为一个电影研究的从业者，八十年代进入大学并完成人生转型，在八十年代离我们一天天远去的时刻，重新进入那个充满多种可能的岁月，检视八十年代的中国、检视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检视自己和同辈人曾经走过但当时未必明白其意义的社会踪迹，不仅仅是一个使命，更是发自内心的热望。

1 旷晨、潘良编：《我们的八十年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2 旷晨、潘良编：《我们的八十年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

二、文献综述

相对于创作的繁盛局面来说，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研究也在诸多层面上展开，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做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探索，且富有成果，这些研究为后来者的探讨起到了先导作用、奠定了基础。

1988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著、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电影10年》采用论文专题分析的方式对诸多电影现象进行了研究，该书收集了27篇论文，对1976—1986年间的中国电影创作进行分析，聚焦的重点在于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和新的电影美学观念的开拓。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荒煤主编的《当代中国电影》对1977—1984年的新时期中国电影进行了基本的线索梳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那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进行了主流叙述。

1989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李兴叶先生撰写的《复兴之路——1977年至1986年的电影创作与理论批评》，其中谈了三个部分：1. 新时期十年的电影创作历程；2. 理论与批评；3. 导演论。其中导演论谈了三个问题，谢晋电影、中青年导演的探索、青年导演在1983、1984年，分析的视点基本立足于电影本体和电影历史。

1997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程代熙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其中的《新潮影视编》由蔡师勇先生撰写，共有五章：1. 新潮电影的初潮——《太阳和人》；2.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3. “娱乐片”——新潮电影的另一副面孔；4. 新潮电影理论；5.《河殇》——自由化思潮的活标本。这本书中，作者指出：本文使用的“新潮电影”是用于概括在新时期电影领域受“全盘西化”影响或本身就属于“全盘西化”思潮一部分的电影现象。由于本书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使该编的立论在客观性方面有所缺失。

呼应《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五年后（200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艺主潮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在1989年之后编写的一部关

于新时期文艺的论述。其中的“影视编”由章柏青先生撰写，共有四章：

1. 现实精神的回归；2. 历史意识的回归；3. 人的主题的开掘；4. 艺术探索的多样化。该编以上述四点作为观察视角，探索新时期电影的正面成就。

199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饶朔光、裴亚莉撰写的《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采用问题分析的形式讨论了新时期电影的诸多问题，1. 伤痕电影；2. 纪实电影；3. 改革电影；4. 文化反思与电影创作；5. 娱乐片；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7. 主旋律影片；8. 新时期电影理论；9. 第四代；10. 第五代；11. 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和女性形象；12. “西部电影”；13. 新时期城市电影；14. 新时期农村电影；15.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电影。

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锦华撰写的《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在第一部分“斜塔瞭望”中以“斜塔：重读第四代”、“断桥：子一代的艺术”、“遭遇他者：‘第三世界批评’阅读笔记”、“性别与叙事：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寂静与喧嚣：在都市的表象下”等题目对八十年代的电影进行诸多的意识形态、性别等分析。

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陆绍阳编著的《中国当代电影史：1997年以来》，以分期命名的方式来进行问题分析：徘徊年代、补课年代、改良年代、浪漫年代、娱乐年代、高歌年代、写实年代。

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文化史》，该书第四编：整合的文化阐发（1979—2004），其中第十四章为“中国内地：观念更新热潮与电影文化重构”，谈了6个问题：1. 中国内地电影的开放进程与面向市场的电影选择；2. 谢晋及其电影模式的讨论；3. 第四代导演及其诗化历史的主体意识；4. 陈凯歌：历史重构与文化反思；5. 张艺谋：民族特质与创新业绩；6. 新生代导演的个体写作与生存困境。

海外的学者对当代中国电影也有许多著述，杰罗姆·斯尔伯格德（Jerome Silbergeld）撰写的 *China into Film: Frames of Refer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高度评价中国电影，作者认为，从1984年，中国电影作为新人者成为国际电影舞台上最生动的一幕。作为一个艺术史的教授，杰罗姆认为中国电影导演大量运用寓言式写作是为了应对电影审查，他研究

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导演、情节剧叙述方式以及“毛主义”、“后毛主义”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影响。他的主要贡献是研究在中国革命不断地削弱历史传统影响的背景下，传统是如何存留在中国电影文化之中，中国电影导演如何在兼容传统的情况下来建构现代中国电影。

哈瑞·库素（Harry H. Kuoshu）主编的 *Celluloid China: Cinematic Encounters with Culture and Society* 分章节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1. 情节剧内外的历史：荣誉、罪魔和迷狂。2. 为他者发言：女性寓言角色的演进。3. 电影奇观：少数民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在他者”。4. 中国面对西方：黄土地下面的根。5. 新城市电影：黄土地经验之外的后社会主义。

裴开瑞（Chris Berry）1991年编著的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nema* 以广阔的视角讨论了中国电影的过去和现在，尤其是“第五代”和他们面对的政治经济压力。2003年，裴开瑞又主编了另一本有关中国电影的专著 *Chinese Films in Focus: 25 New Takes*，对25部中国电影进行了新颖的读解，主要尝试用新的方法论读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其他离散的华人的作品，历史跨度从1930年代至当前。

尼克·布朗（Nick Browne）等人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新中国电影：形式、身份、政治》）有四篇文章论及中国内地电影，有两篇文章讨论情节剧，另一篇毕克伟（Paul Pickowicz）的文章研究“黄建新与后社会主义中国”。再有一篇是裴开瑞撰写的关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文章，裴开瑞的结论是：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和社会变化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目标（主体）：它太复杂、太矛盾、太变动、太无序，难以抽离出要点去分析和描述。但他也认为这种不可能也不意味着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和社会变化超出了理解的范围。相反，它意味着要想准确地理解八十年代电影，就必须拒绝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方法。

应该正视，现有的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研究大都以史的形式作纵向的陈述，或以本体论、作者论、作品论和现象论的研究视点进行论述，尤其海外的研究大多把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研究化约为“第五代电影”研究，或者有些

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直接由九十年代开始，把八十年代打入暗区。所以以新的视角把八十年代电影作为一个文本与中国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的综合分析、发现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独特品性和文化价值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三、研究的重点及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空间构成、冲突模式等范畴的研究分析来考察电影如何以文本的形式在那个特定时代对中国形象予以建构，在立足分析文本中的“中国人是一个（一些）什么样的形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何以被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和“怎样被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

本研究将把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研究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再现关系，分析作品中的意象、隐喻及文化价值，力图发现中国电影导演在当时表露出的共同的创作心结，中国电影作品在特定时代展露出的特定的创作元素及其文化意义。同时，还需要阐明的是，本研究不是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断代史，也不是一个第五代的专题研究，而是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叙事模式、冲突等特定视角出发，分析研究当时的电影作为叙事文本如何在那个交错的年代里反思历史、再现当代、想象未来，尤其是当时如何认识身处其中的八十年代，以及如何构想中国未来和个人未来。

八十年代的电影如何想象式地建构人物形象，怎么样选取并改造现实空间从而在银幕中建构一个有关中国的叙事空间。建构性的人物行走在组合的空间中，传达了什么样的意义，是什么样的力量在驱使这种（这些）意义的产生。这些都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

如此的研究，在不同的对象，如文学、文化方面；在其他的国度，如美国、英国、德国都有开展。文学方面，比较有价值的著述有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撰写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故事》、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赵稀方的《小说香港》、蔡益怀的《想象香港的方法：香港

小说（1945—2000）论集》等。西方世界此类的研究，早期就有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著名的《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近年英国也有一些相关领域的论述出版，就英国电影与英国社会和不列颠民族身份建构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约翰·赫尔（John Hill）撰写的 *British Cinema in the 1980s: Issues and Themes*；杰弗瑞·理查德（Jeffrey Richards）撰写的 *Films and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From Dickens to Dad's Army*。海内外的这些研究都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和学理方法。

研究者大都会对电影等艺术活动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论证，进而肯定此一研究视角的价值。王德威论述道：“作为社会性象征活动，文学与电影不仅‘反映’所谓的现实，其实更参与、驱动了种种现实变貌；作为大众文化媒介，文学与电影不仅铭刻中国人在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也遥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潜意识。文学暨电影工作者还有他们的观众，运用想象、文字、映象所凸显的中国，其幽微复杂处，远超过传统标榜纯知性研究者的视野极限。”¹

当然，克拉考尔作为一个著名的电影史论学家，对于德国电影与德国人心灵世界的再现关系所提供的研究思路和学术理据，更值得我们在电影研究中给予重视。意大利的电影史学家李奥纳多·科瑞尔索玛（Leonardo Quarrelsome）是一位研究克拉考尔的专家，他认为，电影和社会之间存在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克拉考尔把电影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品”，因而可以对电影的社会功能进行系统的研究。克拉考尔特别关注“电影独特的结构形式和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克拉考尔也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没有其他艺术形式能像电影那样捕捉到社会生活中那稍纵即逝的瞬间的特征。“电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表征’，‘电影为隐匿的精神轨迹提供了线索’，是‘内在欲望的外在投射’。简短地说，‘电影是一个社会的见证物，

1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0页。

它能够捕捉到不易察觉的社会神经。它的视野就是文化无意识’。”¹

克拉考尔等先行者的探索表明，电影是一个满足大众欲望的文本，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高涨的年代，是一个极度压抑之后欲望萌生、变异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年代，所有这些纷繁多变的踪迹如何再现于电影文本中，它们传达的意义、当时的大众如何接受这些意义、今天我们如何学理地评价这些意义，都是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四、研究方法

前面的论述中已经就本研究将使用的方法做了一定程度的陈述，为了更清晰地阐明本研究开展的学理资源，在此就相关学者提供的研究方法思路进行简要的分析。

在学术理论方面，一些学者的探索和清晰的理论陈述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可行的学术路径。

法国研究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要求学者在研究中“重视文学作品，重视其生产、传播、接受的条件，同样也要研究一切文化材料，我们是用这些材料来写作、生活、思维的，或许也是用它来幻想的。形象把我们引向了许多或然问题的交叉处，它在这里犹如一个启示者，特别揭示出了一个社会在其意识形态（如种族主义、异国情调等）中，当然也在其文学体系中，以及在其社会总体想象物中的某些运作。”²

巴柔从文学角度提出了研究的路径，电影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研究思路，罗伯特·考克尔（Robert Kolker）在 *Film, Form, and Culture* 一书中就电影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如何将一种文化研究理

1 Siegfried Kracauer,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Copyright @ 1947, 2004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论与理解电影的形式结构结合起来？如何解读电影文本？如何将电影文本放到较大范围的文化实践和文化整体中去解读？他阐述道：“这一任务包括潜心观看一部电影并发现它是如何被合成在一起的，要观察它的形式、讲述故事的结构、主角和其他演员的作用，等等。我们需要抓住一部电影的主线结构，即它在讲述什么。我们要把电影放到同类电影中去考察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然后，我们需要将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并从其产生的年代以及被分析的年代着眼来分析这部电影。换句话说，我们将力求像产生这部电影的那个年代的人那样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再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这部电影。”¹

本研究还注意到媒介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关系，吉登斯在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说道：“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² 这句话可能某种程度上有些极端的成分，但他提醒我们正视媒介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镜像关系，在审慎地开展与此相关的研究时，巴柔提供的一些思考仍然是有建设性的。“形象学所研究的绝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这个层面的研究当然也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形象描述了某些‘事实’，是用词语来表述后者的，就此而言，所有的形象必然都是虚假的）；形象学也绝不仅限于研究对简称为‘现实’的东西所做的文学置换。它应该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³ 巴柔的学术着重点在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形象问题，但他提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我们从事电影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1 [美] 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郭青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2页。

2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页。

3 [法]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第一章

拨乱反正年代的 银幕叙事

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的著名导演，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同时，也是活跃的左派人士，正由于此，“文革”时期，封闭的中国邀请他入境拍摄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新面貌的纪录电影。在中国期间，安东尼奥尼受到官方的周密接待，在北京、上海、河南林县等地展开拍摄活动，在官方的支持下，他拍摄了学校、工厂、幼儿园、剧院、医院、农村以及“文革”期间的大众业余休闲活动，在尽量捕捉中国人精神面貌的画面的基础上，安东尼奥尼附上了他的阐释：“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¹

但是对于安东尼奥尼完成的影片《中国》，中国与海外不同的视角却产生了极大的政治歧见。中国方面自1974年元月开始对安东尼奥尼及其《中国》展开有组织的批判，这项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仅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²而这些批判文章的重中之重，就是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文章的标题自然带有“文革”的战斗气息——《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电影》。文章的开篇还是较为理性，“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文章承认面对

1 北太西、李宏宇、张悦：《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中国〉》，《文摘周报》2007年8月14日，第5版。

2 北太西、李宏宇、张悦：《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中国〉》，《文摘周报》2007年8月14日，第5版。